



吕进 主编

中国现代诗学丛书

中国新诗：现象与反思

向天渊 著



人民出版社

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现代汉语的诗性潜质与中国新诗的语言智慧研究”
(15BZW150) 中期成果

中国新诗：现象与反思

向天渊 ◎著



人 民 出 版 社

策划编辑:陈晓燕
责任编辑:陈晓燕 卢典
装帧设计:九五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新诗:现象与反思/向天渊著.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4
(中国现代诗学丛书/吕进主编)
ISBN 978-7-01-016105-1

I. ①中… II. ①向… III. ①新诗—诗歌研究—中国 IV. ①I207.2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6)第 080152 号

中国新诗:现象与反思

ZHONGGUO XINSHI: XIANXIANG YU FANSI

向天渊 著

人民出版社 出版发行

(100706 北京市东城区隆福寺街 99 号)

环球东方(北京)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16 年 4 月第 1 版 2016 年 4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本:710 毫米×1000 毫米 1/16 印张:21

字数:345 千字

ISBN 978-7-01-016105-1 定价:56.00 元

邮购地址 100706 北京市东城区隆福寺街 99 号

人民东方图书销售中心 电话 (010)65250042 65289539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凡购买本社图书,如有印制质量问题,我社负责调换。

服务电话:(010)65250042

上有庙堂之高，下有江湖之远

——《中国现代诗学丛书》总序

吕 进

中国现代诗学与中国新诗几乎是同时发生的。

初期的现代诗学致力于爆破。现在回顾，这种爆破带有历史的必然性与合理性，没有爆破就难以拓出新路。然而这种爆破又是简单与粗放的，连同我们民族的传统诗学精华也成了爆破对象。这就给现代诗学留下了“先天不足”“漂移不定”“名不正言不顺”的缺陷。

百年来，现代诗学在艰难摸索中也有所建树，朱光潜和艾青的《诗论》至今为人关注，闻一多的一些见解至今也具有影响。在 20 世纪的新时期，出现了专业的诗评家队伍，他们成为力求建立属于新诗的诗学话语体系的主力军。由于没有在现代性地处理与传统诗学的承接、本土性地处理与西方诗学的借鉴上取得突破，现代诗学迄今仍缺乏严谨的学理性与体系性，这就使得新诗迄今仍缺乏诗美标准和文体规范。

进入 21 世纪以来，新诗走向“私语化”，大多数诗评家随之失语，诗人自己的随感式言说和圈子内自道部分地替代了学术话语。

已经有百年历史的中国新诗至今依然立足未稳，新诗文体的合法性依然饱受质疑。有些知名诗人和学者公开表示，新诗是一场失败的艺术实验。有些知名政治家说，给他一百大洋，他也不看新诗。更多的知名新诗人，到了晚年都“勒马回缰写旧诗”去了。

近年写作旧体诗成为热潮，新诗进一步处于尴尬境地。新文学中的小说、散文、戏剧文学在现代中国都有了自己的地盘，唯独新诗的读者却几乎与新诗的写作者复合，新诗成为游离于时代、游离于社会生活、游离于学校和家庭教育之外的“无人赏，自鼓掌”的边缘文体。

新诗是中国诗歌的现代形态，也必然应该是现代诗坛的主体。王国维在《宋元戏曲史序》里讲得对：“凡一代有一代之文学：楚之骚，汉之赋，六代之骈语，唐之诗，宋之词，元之曲，皆所谓一代之文学，而后世莫能继焉者也。”旧体诗迄今依然有其生命力，以后也不会失去生命力，但是作为古汉语的诗歌，旧体诗用于抒写现代人的情愫在形式上会受到诸多局限：现代汉语的双音词、多音词难以入诗；旧体诗的许多形式规范也只是古汉语的结晶。我们读外国人翻译的中国古诗词就可以发现，译者其实是放弃了古诗词的种种形式要素，将中国古诗词译成了中国新诗。

但是古诗所创造的中国诗歌传统，新诗却是必须继承的，它是中国诗歌的“身份证”。当然，这种继承是经过现代化过滤之后的继承，必须回避“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的状况，力求“旁观见审”，有所“健忘”。钱钟书在《中国诗与中国画》中讲过：“除旧布新也促进了人类的集体健忘，一种健康的健忘，千头万绪简化为二三大事，留存在记忆里，省却了不少心力。”

绝对不能赋予诗的“现代形态”以超出诗的边界的权利。既然是诗，就得拥有诗的基本审美规范；既然是中国诗，就得遗传中国诗的审美密码。只有在变革中延续中国诗歌传统的新诗，才有可能受到中国读者的接纳和欢迎。

近年来，诗坛上有的“理论家”频频宣传新诗就是“自由”的文体，宣传忽略甚至放弃诗之为诗的文体要素，宣传忽视甚至放弃诗的文体可能，进一步将新诗推向困惑和无序的境地。什么“新诗就新在自由”“凡大众欢迎的就不是诗”，这类腔调实在应该偃旗息鼓了。

新诗需要生根，新诗需要发展，新诗需要繁荣，新诗需要像唐诗那样得到全民族的认可和喜爱。我们急需现代诗学，急需民族、现代、学理的现代诗学。加强现代诗学对传统诗学的现代性承传，加强现代诗学对西方诗学的本土性借鉴，构建中国现代诗学的完整体系，是新诗的中国梦。

西南师范大学中国新诗研究所成立于1986年6月，迄今已经30年。这是中国文学史上第一家专业的的新诗研究所。“桃李春风一杯酒，江湖夜雨十年灯”，30年来，研究所在诗学界独树一帜，出思想、出成果、出人才、出影响，是国内外人所共知的现代诗学圣地。新诗研究所同仁在现代诗学本体论、中外诗歌比较研究、新诗发展史、歌词研究和新诗评论诸方面多向度地

展开研究工作，取得人所共知的成绩。

作为重庆市首批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由笔者担任主任的西南大学中国诗学研究中心成立于2001年9月，迄今也已15年。中心下设中国新诗研究所（吕进、蒋登科、熊辉先后担任所长）、中国古诗研究所（所长刘明华）、比较诗学研究所（所长陈本益）和中国现代诗学典藏中心（主任李怡），而中国新诗研究所一直是诗学研究中心的基础和旗舰。

诚然，由于地域的原因，新诗研究所在全国的话语权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限制。人们习惯性地更注意北京这种“中心地带”的声音，重庆一些文学新作的研讨会也要特地搬到北京举办，这种费时费力而又无效的做法就是“崇北”心理的典型反映。但是学术思想最终并不会以地域来划分正误，也不会以地域来衡评分量，这一点，以后将会由现代诗学的历史来证明，对此我们抱有充分的信心。我想起苏联时期的塔尔图大学（University of Tartu），这所大学地处爱沙尼亚，原来是一所偏僻地区的无名大学。后来那里出了新审美学派，出了新审美学派的主要学术带头人斯托洛维奇，塔尔图大学由此成为苏联在美学研究领域一所举足轻重的学府。

《中国现代诗学丛书》的创意出自中国新诗研究所熊辉所长、向天渊副所长和所务委员会团队，这是中国新诗研究所成立30周年的一项纪念活动。丛书得以顺利问世，西南大学和人民出版社的全力支持也是必要前提，谨在此致谢。

“不学诗，无以言”，中国是一个诗歌古国，也是一个诗歌大国。这个古国和大国的诗歌传统，如果在新诗这里中断，我们将愧对后人。宋代范仲淹的《岳阳楼记》里有句名言：“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我借用一下：不管世事怎么变幻，上有庙堂之高，下有江湖之远，已届而立之年的中国新诗研究所任重而道远，我愿意最衷心地献上我最美好的祝福。

目 录

上有庙堂之高，下有江湖之远

——《中国现代诗学丛书》总序····· 001

上篇 现象三色堇

“新诗老祖宗”创立的“新典范”·····	003
生命便是死神唇边的笑·····	011
异方的种子落入这方土地·····	020
反传统与传统·····	029
“融突和合”·····	038
智性、复调与诗思自身的设入·····	044
“物之诗”与“人之诗”·····	056
网络诗歌，拿什么来拯救你？·····	066
谁的声音？替谁发声？·····	072
融会贯通，别开生面·····	085

中篇 理论多棱镜

“圣言痞说”与“新诗革命”·····	101
“新诗二次革命论”的有效性阐释·····	109
新诗“公共性”问题的学理背景·····	118
重建新诗“公共性”·····	127
重建新诗精神生态学·····	136

新诗之“变”与“常”的若干阐释维度	145
诗语与神明	150
现代汉语诗学应加强与语言学的合作	159
构建现代汉语“和合诗学”	167
现代汉语诗学中的“合谋话语”	172
中学、西学与东学	182
学院、民间与广场	192
“以中格西”到“以西格中”	207
20世纪汉语诗学中的“言意观”	225
“立象尽意”与“立言救言”	234

下篇 学者数家亲

调和折中：朱光潜诗学建构方法论	251
两镜相入：宗白华美学与诗学的启示	260
精制姿态：何其芳文学史观的系谱学阐释	274
诗意安居：邹绛的学术人生与诗学造诣	290
以情为本：吕进诗学观的一种阐释	298
参考文献	308
后记：容膝而徘徊，委心任去留	320
丛书后记	324

上 篇

现象三色堇

“新诗老祖宗”创立的“新典范”

——胡适《尝试集》的文学史价值与意义

中国新文学革命的历史即将一百年，有关此次革命发起者之一胡适的研究成果，早已汗牛充栋，但对胡适的评价却远未尘埃落定。三十年前，余英时在长篇文章《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胡适——〈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序》（1983）中讲过这样一段话：“从文学革命、整理国故到中西文化的讨论，胡适大体上都触及了许多久已积压在一般人心中而不知‘怎样说才好’的问题。即使在思想上和他完全不同，甚至相反的人（如梁漱溟与李大钊）也仍然不能不以他所提出的问题为出发点，所以从思想史的观点看，胡适的贡献在于建立了库恩（Thomas S. Kuhn）所说的新‘典范’（paradigm）。”^①相对而言，此一论断获得了学界比较普遍的认可。循此推衍，我们也可以说，从文学史的观点看，胡适《尝试集》的贡献，同样在于建立了一个“新典范”，那就是“白话诗”这一文学新体裁。

—

在数千年的中国文学史上，“白话文学”并不鲜见，就以胡适自己在《白话文学史》中的考证结果来看，其历史最晚也可追溯到汉武帝时期。此后，中国文学史上出现了充满生机的白话文学与毫无生气的古文文学的对立。不过，就是这部为“文学改良”寻找更为坚实的理论依据的著作，由于有意扩大“白话”的范围，阑入了大量所谓的白话诗歌。文学改良或革

^① 余英时：《现代危机与思想人物》，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05 年版，第 136—137 页。

命的依据确乎是更为充实了，但如此源远流长的白话文学尤其是白话诗歌的历史，却反过来削减了《尝试集》在文学史上的创新价值。这种学术与创作之间大水冲了龙王庙的吊诡局面，大概是胡适始料未及的。考虑到《白话文学史》并非一部十分严谨的学术著作，有关《尝试集》在中国文学史上的价值与意义，仍值得我们做更加深入的探讨。

新文学运动的性质究竟是“文学革命”，还是如胡适早在1917年就开始提出而后又反复倡言的“文艺复兴”，至今仍是一个悬而未决的命题。对此，司马长风在其《中国新文学史》中给出了一个妥协性的说法：“对文言文而言是文学革命，对白话文学而言则是文艺复兴。”^①这大概比较符合胡适等文学改良与进化论者的胃口，只是这一观点来得晚了些，胡适未能亲眼所见。但我们却不妨据此提出这样的看法：《尝试集》是对古已有之的白话文学的复兴与改良。就其复兴而言，《尝试集》与古代的白话诗歌仍然存在诸多关联，比如直接选用《沁园春》《如梦令》《百字令》《生查子》等旧有的词牌进行创作就是最为明显的表现，尽管这些词作的内容有一定的当下性，但将其放在已经固态化的形式中，势必难以摆脱旧有的调子，无论如何也称不上是鲜活的新诗作。就其改良而言，《尝试集》中的大部分诗作（当然不包括附录《去国集》中的文言诗词了）勇敢地迈出了去文言、去格律的步伐，走上了白话、自由与散文化的新道路。

众所周知，晚清到民国初年出现过一个白话文学创作的高潮期，但就体裁而论，主要集中在小说领域。虽然有黄遵宪、梁启超等人提倡“我手写我口”的“诗界革命”，但从创作实绩看，并无可与白话小说相提并论的白话诗歌的出现。就连此时远在大洋彼岸的胡适也敏锐地认识到文言诗歌是古文文学所赖以抵挡白话文学之全面冲击的最后“壁垒”，“还须用全力去抢夺”。于是，他也“特别提出了‘诗国革命’的问题，并且提出一个‘要须作诗如作文’的方案。从这个方案上，惹出了后来做白话诗的尝试”^②。之所以说是“惹出”来的“尝试”，是因为胡适终于亲自提笔操觚学做白话诗，实在是被一群老友中的反对派“逼上梁山”所致。作为攻打文言诗国壁垒的急先锋，胡适白话诗的系列尝试配以“文学改良”的理论主张，加

① 司马长风：《中国新文学史》（上卷），香港昭明出版社1980年版，第3页。

② 胡适：《逼上梁山》，载《中国新文学大系·建设理论集》，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1935年版，第7页。

之陈独秀的大力鼓吹，沈尹默、刘半农、钱玄同等人的协同作战，到1918年1月，《新青年》四卷一期上终于登出了9首新诗（胡适4首、沈尹默3首、刘半农2首）。正是这九首诗作的登台亮相，标志着新文学的诞生、古文文学的终结！

作为“个人主张文学革命的小史”，胡适1916年以来的白话诗创作，于1920年3月由亚东图书馆以《尝试集》为题结集出版。当这第一部个人白话诗集于1922年10月以销售一万部的骄人战绩印行第四版时，胡适也就在该版自序中理直气壮地宣布：“新诗的讨论时期，渐渐的过去了。——现在还有人引阿狄生、强生、格雷、辜勒律己的话来攻击新诗的运动，但这种‘诗云子曰’的逻辑，便是反对论破产的铁证。——新诗的作者也渐渐的加多了。”^①

不过，也正是在这时，胡适清醒地认识到：“我现在回头看我这五年来的诗，很像一个缠过脚后来放大的妇人回头看一年一年的放脚鞋样，虽然一年放大一年，年年的鞋样上总还带着缠脚时代的血腥气。”^② 这应该是一个属于“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的自我评价，而后来诸多论者对《尝试集》的研究与评判，无论是过渡论、还是工具革命论，几乎都建基于此一“放脚鞋样”的隐喻之上。

二

从初版、再版到第四版，《尝试集》有较大的增删也有较多的修改，但胡适《再版自序》中自己认可的十四首“白话新诗”，除《周岁——祝〈晨报〉一年纪念》一诗在第四版中被删去之外，仅对《你莫忘记》添了三个“了”字、《一笑》改了两处。就此看来，《尝试集》中至少有十三首作品是胡适比较满意的。我们不妨就以这些诗为样本稍做分析，期望能以此打量《尝试集》在白话诗创作上所达到的艺术高度，并借以评说其在文学史上的价值与意义。

这十三首诗作中，《老洛伯》《关不住了》《希望》是翻译作品。其中

^① 胡适：《尝试集》，人民文学出版社2007年版，四版自序，第3页。

^② 同上。

的《关不住了》被胡适看成他个人的当然也是整个“‘新诗’成立的纪元”。在今天看来，翻译与创作似乎不能混为一谈，但在五四时期的诗人们，却往往将两者等同起来，比如郑振铎在1922年就曾说过：“所谓文艺的出产自然把本国产——创作文学——和外国产——翻译文学——都包括在内。我们把翻译看作和创作有同等的重要。”朱湘也曾指出：“译诗这种工作是含有多份的创作意味在内的。”^①胡适也理所当然地视此为自己的创作了。《关不住了》发表于1919年3月15日的《新青年》六卷三期，译自莎拉·特斯代尔（Sra Tersdale）的 *Over the Roofs*，让我们把译诗和原诗排列如下：

关不住了！	<i>OVER THE ROOFS</i>
我说：“我把心收起，	I said, “I have shut my hart
像人家把门关了，	As one shuts an open the door,
叫爱情生生的饿死，	That Love may starve therein
也许不再和我为难了。”	And trouble me no more.”
但是五月的湿风，	But over the roofs there came
时时从屋顶上吹来；	The wet new wind of May,
还有那街心的琴调	And a tune blew up from the curb
一阵阵的飞来。	Where the street-pianos play.
一屋里都是太阳光，	My room was white with sun
这时候爱情有点醉了，	And Love cried out in me,
他说：“我是关不住的，	“I am strong, I will break your heart
我要把你的心打碎了！”	Unless you set me free.”

两相对比，我们会发现，胡适的翻译在诗节的划分、诗行的外在排列方式上和原诗大体一致，但在韵律、句式上，胡适却有意破坏原诗偶句押韵、语句凝练的特点，使得译诗具有明显的散文化倾向。翻译、发表这首诗作时，胡适有关新诗的看法已渐趋成熟，在作于同年10月的《谈新诗》一文

^① 参见秦弓：《二十世纪中国翻译文学史·五四时期卷》，百花文艺出版社2009年版，第10页。

中，胡适认为“近来的新诗发生，不但打破五言七言的诗体，并且推翻词调曲谱的种种束缚；不拘格律，不拘平仄；不拘长短；有什么题目，做什么诗；诗该怎样做，就怎样做”^①。这既是对新诗现状的描述，也是胡适对新诗创作原则的概括。以此衡量《关不住了》，的确配得上“开了中国诗歌新纪元”的称誉！另外两首译诗虽未获如此殊荣，但也基本上摆脱了旧诗格律与音调的束缚。这也证实了译诗对中国新诗现代性之发生的巨大影响。

其余十首诗作，除个别词语直接从古文中搬来以外，从形式上看，都可谓完成了脱胎换骨的革命性变化，当得起胡适所谓中国诗歌发展史上继骚赋文学、五七言诗、词曲之后的“第四次的诗体大解放”；但如果从诗的精神上看，这次解放依然只能算是“放脚鞋样”，虽力求从旧诗的情绪中获得解脱，但恰如处于蜕变中的蝉蛹，尚未充分展开自由飞翔的翅膀。

如果加以细分，这十首诗作的主题包括咏物（《一颗星儿》）、怀人（《许怡荪》）、忆旧（《一笑》）、迷情（《“应该”》）、忏悔（《上山》）、警醒（《你莫忘记》）、自励（《老鸦》）以及抨击时弊（《一颗遭劫的星》《乐观》《威权》）等。很显然，咏物、怀人、忆旧都是传统诗歌中常见的内容。那三首抨击时弊的作品，都可谓有感而发，在题材上与旧诗中的讽喻之作已有较大差别，在形式上也运用了对话、隐喻、象征等现代诗歌常用的表现手法，相当程度地体现了现代讽刺诗的特征，但题材较单一、感染力不够强烈，其批判精神、艺术水准尚未超越“补察时政、泄导人情”的新乐府诗。“忏悔”属于与西方影响密切相关的现代主题，但胡适这首《上山：一首忏悔的诗》，虽然篇幅不短，但内涵却幼稚、单纯，缺乏震撼人心或舒缓痛苦、祈求谅解的感染力，更不用说宗教层面上的认罪与洗礼精神了。《你莫忘记》、《老鸦》两首，也只能说是具有较强训诫、励志色彩的小诗，理性有余，情感不足。

在这十首作品中，表达“迷情”主题的《“应该”》，情况较为特殊，还需稍加辨析。全诗如下：

他也许爱我——也许还爱我——
但他总劝我莫再爱他。

^① 胡适：《谈新诗》，载《中国新文学大系·建设理论集》，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1935年版，第299页。

他常常怪我；
这一天，他眼泪汪汪地望着我，
说道：“你如何还想着我？
想着我，你又如何能对他？
你要是当真爱我，
你应该把爱我的心爱他，
你应该把待我的情待他。”
他的话句句都不错：——
上帝帮我！
我“应该”这样做！

显然，这首篇幅并不长的诗作，表达的情感却是繁复而丰满的。巧妙的对话形式，塑造了一对因深陷爱情困境而迷惘挣扎的恋人。因为两人的爱情涉及那没有出场的第三个人，于是牵扯上情爱伦理的抉择问题。尽管诗人请出万能的上帝，希求获得帮助，并最终做出“我‘应该’这样做”的选择，诗歌也在这看似毅然决然的选择中戛然而止。但诗人或者说抒情主体，尤其是相爱双方那绵绵无尽的痛苦，却并未就此结束，反而变得更加强烈与持久。

应该说，这首诗作确实超越了中国古代情爱诗词中相思、悼亡的迷情模式。如此丰沛、复杂的情感纠葛，出之以节制、含蓄的表达方式，可谓匠心独具。更为难得的是，如此短小的一首诗，包含着“我、他、‘他’”以及“上帝”四个主体，爱的艰辛、爱的无助，通过有声的独语、对话、祈求与无语的沉默彼此对照、相互应和的方式获得充分的表现。整首诗中，“你”、“我”、“他”三个人称代词共出现 26 次之多，超过全诗 100 个汉字的四分之一，却不显烦琐与做作，原因就在于，口语化的对白与独语体的心理描绘，传达的是一份既浓郁又真挚的情感。由于作者胡适的缘故，我们很容易将诗中的抒情主体“我”视为男性，而把其中的两个“他”想象成两个女子，因为我们知道，作为女性专用的人称代词“她”那时还未流行开来。但到了今天，我们还可以转而将“我”视为女性，将两个“他”想象成两名男子，将整首诗也视作是中国古代“男子作闺音”传统的现代延续。这或许是错中错、圆外圆的一种阅读收获。

说到这里，我们还得交代一下这首诗的创作缘起，在《尝试集》初版

中，这首诗的前面有如下序文：

“我的朋友倪曼陀死后，于今五六年了。今年他的姊妹把他的诗文钞了一份寄来，要我替他编订。曼陀的诗本来是我喜欢读的。内中有《奈何歌》二十首，都是哀情诗，情节狠凄惨，我从前竟不存见过。昨夜细读几遍，觉得曼陀的真情有时被辞藻遮住，不能明白流露。因此，我把这里的十五、十六两首的意思合起来，做成一首白话诗。曼陀少年早死，他的朋友都痛惜他。我当时听说他是吐血死的，现在读他的未刻诗词，才知道他是为了一种狠为难的爱情境地死的。我这首诗也可以算是表章哀情的微意了。八年三月二十日。”^①

读了这段序文，我们或许会恍然大悟，这首被胡适自诩为是一种“创体”的新诗^②，原来是对故友旧体诗作的一种改写或“翻译”。联系《关不住了》也是翻译的事实，我们不禁要问，为何《尝试集》中颇为成功的两首代表性作品居然都是“翻译”的结果呢？这当然可以从翻译现代性、传统的现代转换等视角去阐释其中的奥秘。但我们也可以简单地回答这一问题，那就是胡适个人人生经历的单纯，造成他诗歌作品内容的简单、情思的清浅。而这两首新诗，之所以相对成功，除了白话化、散文化等“诗形”上的革新之外，思绪纷纭、情感繁复这些“诗质”上的丰盈与充实或许是更为主要的原因。只可惜，这些都是胡适从别人那里借来的。

三

正如奚密在论述新诗与旧诗的区别时指出的那样：“比形式和意象更重要的是感性，这种感性明显流露诗的现代气质。”^③这里所谓的“感性”，经过形式的规范与塑造，就转变成我们常说的“诗歌精神”了。只有新的形式配以新的精神，才算是形神兼备、文质彬彬的“新诗”！胡适《尝试集》虽然有开创“白话诗”这一诗体“新典范”的价值与意义，但由于其

① 转引自胡适：《尝试集》，人民文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45页。

② 参见胡适：《尝试集》，人民文学出版社2007年版，再版自序，第181—182页。

③ [美]奚密：《现代汉诗：一九一七年以来的理论与实践》，上海三联书店2008年版，第2页。